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的身份认同 与制图观转型*

陈琳 罗宝川

提 要: 随着近代西方地学知识传入中国,方志地图的绘制主体产生身份游移和观念转型等问题。通过爬梳近代西南地区180余位方志地图绘制者的生平事迹后,我们发现:一方面,这一群体没能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也未能突破明清以来“士绅社会”的拘囿;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近代过渡阶段,绘制群体的制图观呈现出“新旧皆非”的矛盾状态。探析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的身份变迁与观念转型,分析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传统舆地观与新兴地学论的诸多特征及其规律,对深入研究我国近代方志学乃至地图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近代方志地图 绘制群体 身份认同 制图观 西南地区

近代以降,方志编纂尤为世人所重,一则因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广泛传入,普遍激发国人对天朝之外多元文明的空间想象。《游历日本图经》《大英国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联邦志略》等“域外图志”的传播使得人们在更新“天下观”的同时,产生了重新定位自己居处的“地域意识”^①;二则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近代知识阶层从未如此切身体会到疆土沦丧与国耻家恨的情感冲击^②,人种优劣与社会进化等西方思想的译介迫使他们反躬自省,回归乡土地方,思考“乡土与领土”^③的一体性问题。于是,在视觉空间层面,近代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大规模重绘方志地图来确认乡土区界的历史化过程,建构符合近现代背景的疆界领土意识。

在此民族情绪的推动下,近代方志地图迎来编绘高潮。诸多志书在凡例和图序中都重申绘制方志新地图对于军政治理的重要作用——“平时之应如何教养扶绥,遇变之应如何攻守防御,皆有赖于图”^④。近年来,不少近代方志地图研究者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还从绘制特点、编印

* 本文为2024年四川旅游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沿线家谱地图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SC2024Z0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青年项目“近代巴蜀方志城图与区域社会研究”(项目编号: XNZSSH23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地方志理论研究”专项课题“近代四川特色方志地图编目、述要与政务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C23DF009)阶段性成果。

①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和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参见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中国研究月报》2005年第59卷第3号。

③ [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④ 佚名修:民国《清镇县志稿》卷1《方輿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36册,第465页。

出版、近代转型等维度展开充分讨论,成果蔚为壮观^①,但围绕近代方志地图绘制群体还未有系统地思考和论述。^②鉴于此,笔者以西南地区为研究视域,从川、滇、黔三省 106 部近代(1840—1949)方志中整理出 180 位地图绘制人员,试图揭示这些“边缘知识人”^③的身份建构、自我认同、绘制观转型的历史细节,借此重新认识处于智识菁英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知识群体,是如何在地图编绘领域以“中国经验”回应近代之变的中国。

一 知人论世: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之构成

自鸦片战争始,屡丧疆土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启各项新政改革,众多新政中促成近代方志地图绘制人数激增的举措至少有两项:一是清末城镇乡自治,二是大力兴办新式学堂。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本意虽在推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变革,但在客观上却引发城镇乡各级自治区域因边界划分问题产生的权益纠纷。佐藤仁史通过考察晚清江苏城乡区界之争指出,为了自证辖境管理范围的可信度,当地士绅几乎都将“方志收录的地图所划定的空间”作为图像佐证。^④由是,各地士绅为争取自身利益,纷纷强调重绘本境地图的重要性,“村落分图,大小县界,详及临封,皆与自治有密切之关系”^⑤、“矧今注重自治……與图尤宜讲究”^⑥、“地图应聘专家实行测绘”^⑦等语开始频频写入近代志书之中。此乃近代方志地图编绘兴起原因之一。此外,1905年科举制彻底废止,士林风气发生根本性扭转,新式学堂逐渐成为士人向往之地。川、滇、黔三省测绘教育顺势兴起,类似四川陆军测绘学堂、云南陆军测绘学堂、贵州新军随营学堂测绘班等各类教育机构为近代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测绘人才^⑧,他们之中有不

- ① 参见赵心愚《宣统〈盐井乡土志〉的“图”及其绘制特点与价值》,《民族学刊》2014年第1期;刘增强:《近代化进程中云南地理志舆图演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王慧《从画到图:方志地图的近代化》,《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1期;王洋《民国时期方志的流通、传播与编辑理念的革新》,《编辑之友》2019年第11期;张英聘《方志地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应用》,《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3期;何沛东《近代方志印数考》,《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4期;成一农《社会变迁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地图绘制转型研究》,《安徽史学》2021年第4期;朱琳《“去地方化”与现代阅读趣味:民国时期方志的出版与市场宣传》,《出版发行研究》2022年第4期;曾荣、陈韵茵《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1期,等等。
- ② 关于方志地图绘制人员的研究,用力最勤者当属潘晟,参见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潘晟《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此外还有张慧芝《郭象升与山西方志图编绘的近代转型》,《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6期;李薇《浅论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2期;刘高伟《清代方志地图作者初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韩天《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及其作者考证》,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颜全己《论邹汉勋对地方志舆图绘制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4期,等等。
- ③ 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 ④ 参见[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第48页。
- ⑤ 江钟岷修,陈廷棻纂:民国《平坝县志》卷首《县图八幅总说》,民国21年(1932)铅印本,不著页码。
- ⑥ 佚名修:民国《清镇县志稿》卷1《方輿一》,第465页。
- ⑦ 罗国钧监修,刘作铭、薛志清等纂辑:民国《夹江县志》卷首《凡例》,民国24年铅印本,第8页。
- ⑧ 参见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测绘志》,成都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350—354页;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云南省志·测绘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9—315页;贵州省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测绘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7—189页。

少人积极投身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的勘查、摹绘、测量、印制、出版，极大推动了近代西南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因不少方志仅记载绘者姓名、教育背景、身份职业三者中其一或其二，实难窥其全貌，故笔者翻检史料，爬罗剔抉，这里仅将三者信息完备者胪列如下（此处暂不考虑冒名情况）：

表1 近代西南方志所载部分绘制人员教育背景、身份职业情况表

姓名	教育背景	身份职业	出处
张廉	绘图学堂，游学日本	巡检	民国10年（1921） 《金堂县续志》
罗恺	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四川陆军测绘学堂、北京高等测绘学堂	重庆浮图关军事教育团地形教官、陆地测量总局中校股长	民国21年 《渠县志》
曹宅麻	四川高等学堂	昭觉县知事	民国30年 《汉源县志》
杨天镇	四川通省蒙养师范学堂	增生，蓬溪县视学	民国24年 《蓬溪近志》
霍新吾	叙府中学、四川陆军测量局地形科	南川县矿务局长	民国20年 《三台县志》
曾世礼	尊经书院	湖北补用知县委高等审判厅刑厅推事、湖南湘乡县知事署雷湾盐厘局事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蓬溪县续志》
李遐准	四川省三中学校	江安县高小学校校长	民国12年 《江安县志》
黎光筠	前四川省署技正日本土木科	测绘主任	民国10年 《合川县志》
陈维璜	合川县中学校	测绘助手	
张传焕	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	测量助手	
张子英	高工毕业	高小学校教习	民国19年 《名山县新志》
胡光第	师范毕业	东区两级小学校教习	
凌济弘	四川大学外语科	国民党云阳县副参议长，县府秘书科长	
陈国璧	达县联中校	测绘帮办员	民国22年 《达县志》
余彦良	雅安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	小学国语、地理教员	民国17年 《雅安县志》
徐正学	测绘学社	上海三育大学教员	民国15年 《大定县志》

(续表)

姓名	教育背景	身份职业	出处
吴 珣	云南电政学堂	分省补用县丞、思茅电政局长、滇黔电政监督、云南省电报局局长	清光绪二十五年 《普洱府志稿》
金幼琦	德江县立两等小学堂	学堂教员	民国 31 年 《德江县志》
林际鹤	安顺县立旧制中学	镇宁县主任科员	民国 36 年 《镇宁县志》
陶鸿焘	美国密歇根矿业大学	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云南省立美术学校校长，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1921—1927），1936年7月至1950年筹备云南矿业公司，任职经理	民国 13 年 《昭通县志》
刘 儗	云南武备学堂	廪生，滇缅划界及勘滇川铁路员委、嵩明水利局长	民国 34 年 《嵩明县志》
俞光富	楚雄师范学堂	附生	清宣统二年（1910） 《楚雄县志》
周德华	江津中学	姚安县田赋管理处科长	民国 37 年 《姚安县志》
布青阳	大理迤西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博物实习科	教员，楚雄禄丰县阿陋井场场长	民国 13 年 《盐丰县志》
张述祖	云南省立测绘学堂	镶黄旗人教习	民国 6 年 《大理县志稿》
董 固	云南省立测绘学堂	陆军中尉	
王开周	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校、云南测绘学校	蒙化县教育局局长、县立中学美术教员、民众教育馆馆长	民国 《宾川县志》

与明清时期参与绘制方志地图的成员相比，近代绘制群体不再单纯由儒生、画匠、刻工充任，成员的教育背景、职业构成、所在地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从毕业学校来看，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出自测绘学堂、矿业学校、师范学堂、军校、中学、大学等新式教育机构，不少人还走出了国门，留学海外。如四川金堂县人张廉“绘图学堂毕业，游学日本”^①，云

① 王暨英等修，曾茂林等纂：民国《金堂县续志》卷7《选举·学校毕业》，民国10年（1921）铅印本，第18页。

南昭通人陶鸿焘留学美国密歇根矿业大学采矿冶金科^①；第二，从职业构成来看，毕业后参与西南方志地图的绘制人员并不仅仅从事与测绘事务直接相关的工作，他们往往身兼数职，一些人选择进入教育机关，一些则投身近代电政、水利、矿务、地籍测绘等事业。如云南楚雄人步青阳先后执教于“云南优级师范博物科、云南高级工矿学校、云南省农业学校、美术专科学校等，担任图画、书法及制图教员”^②。云南昆明人吴珣，曾任思茅县电政局长、云南省电报局局长，此外还担任中英耿马勘界谈判代表^③；第三，从地域分布来看，参与绘制四川（含重庆）方志地图者共127位，云南共31位，贵州共22位，与桑兵统计的《1909年学备区域分布表》^④所反映的川、滇、黔三省人数比例基本吻合，呈现出四川总人数多于云南，云南又多于贵州的增长趋势。

除此之外，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转型处于新旧交替、新旧共存的过渡阶段，他们并非全为新式学人，表1中不难看到“巡检”“增生”“附生”等旧式士绅的身影。在被统计的180位绘制人员中，取得传统功名或进入士绅阶层人数共计49人，占总人数的27%。考虑到仅存姓名和身世无考者共有86人，在总人数中去掉这86人后，那么传统士绅占比将上升至52%。我们采用张仲礼对中国士绅成员的分类作为绘制群体身份的划分依据^⑤，制成表2：

表2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身份构成与对应人数

身份（旧式士绅）	人数	身份（新式学人）	人数
举人	1	测绘学堂	11
知州	1	师范学堂	5
县丞	1	武备学堂	4
廪生	7	高等学堂	2
附生	7	铁道学堂	1
增生	6	实业学堂	2
从九	2	电政学堂	1
岁贡	4	农会学校	1
候补生	5	高级小学堂	1
童生	3	中学	9
监生	6	大学	2
照磨	1	海外留学	2
巡检	1	讲习所	1

① 参见云锡志编委会编《云锡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14页。另说陶鸿焘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矿业冶金专业，参见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8页。

② 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楚雄人物》，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

③ 参见《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0页。

④ 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9页。

⑤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续表)

身份 (旧式士绅)	人数	身份 (新式学人)	人数
庠生	3	测量学校	1
太学生	1	测绘学社	2
总计	49	总计	45

说明: 180 位绘制人员中仅存姓名和身世无考者共 86 人; 身份既属于旧式士绅, 又进入新式学堂者有 7 人; 其他身份如本县邑人有 2 人, 传统绘士、布衣、书士各 1 人^①

从表 2 统计人数来看, 担任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者的旧式士绅与新式学人总数相当, 前者人数甚至略多于后者。这一结论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通常认为的近代西南方志地图几乎由新式学堂毕业生绘制的看法。换句话说, 在清末引进新式教育的时代背景下, 数量庞大的旧式文人并未坐以待毙, 他们在历史剧变之下积极谋求出路。尤其是科举制度彻底废止后, 旧式文士不论年岁高低, 纷纷进入新式学堂, 以至于出现“清末学生由士人脱胎而来, 小学以童生为主, 中高学堂则生员居多”^②的局面。表 2 “旧式士绅”群体中, 廪生、附生、监生数量最多, 而举人、知州等则相对较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 从身份来看, 因为廪生等属于下层士绅, 他们虽拥有一定范围的特权, 但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远远逊色于上层士绅, 而新方志编纂恰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报酬的机会。比如参与编纂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人员多达 46 人^③, 其中一些通晓绘画的下层士绅被安排从事地图绘制的工作; 其二, 从职责范围来看, 上层士绅通常寄居省府, 他们的职责和身份决定地方性事务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而下层士绅因身处家乡, 往往十分热心本乡治安、团练、赈灾、义学等基层日常事务; 其三, 对于地方执政官员而言, 日常政务治理仰赖下层士绅以及其各种私人关系。本县本境地图测绘, 需要制图者十分熟悉当地复杂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因此下层士绅往往是佐助官员测绘方志地图的最佳人选。比如民国《西昌县志》县图、区图以及《八景名胜图》均出自于当地画家马骥之手^④, 光绪《丽江府志》地图由当地廪生张文湛绘制。^⑤

二 置身事内: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的身份认同

如前所述,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主要分三类: 一是从小接受传统旧学教育, 甚至在晚清科试上取得了一定功名的举人、知州; 二是出生于科举制废止前后, 幼时学于私塾, 稍长进入测绘学堂的童生; 三是全面接受西方测绘教育, 充分学习西方新知的适龄学童。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构成复杂, 智识能力不齐, 个体心理迥异, 自我身份认知并不十分清晰。概言之, 影

① 除上述人物外, 另有抗战时期西迁高校教师出面绘制方志地图的情况。如民国《遵义新志》地图“以民国二十九年陆地测量局出版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粉本, 根据实察资料, 凡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之分布, 填绘于图”。参见张其韵: 民国《遵义新志》, “引言”, 民国 37 年 (1948) 铅印本, 第 2 页。因这部分群体绘制方志地图的背景特殊, 人数较少, 兹不列入本文研究对象。

②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第 135 页。

③ 参见郑贤书等修, 张森楷纂: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首《题名》, 民国 10 年刻本, 第 1—3 页。

④ 参见郑少成等修: 民国《西昌县志》卷首, 民国 31 年铅印本, 第 7 页。

⑤ 参见李星瑞修, 陈宗海纂: 光绪《丽江府志》, “修纂职名”,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刻本, 第 11 页。

响绘制群体身份认同困境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 学堂教育“新瓶装旧酒”。在科举制彻底废止之前, 早期新式学堂虽伴随新政在各地举办, 也培养了一些船政、水师、矿务、语言等方面的人才, 但在根本上, 新式学堂并非社会取士的唯一途径, 选择新学的学生只是将其视作跳板, 或准备科考, 或是等待实缺, 如此毕业的学生仅袭西学皮毛, 难补朝廷用人之需。在科举制度废止后, 学堂虽取代私塾成为新式教育的主阵地, 但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业质量的提升并非同步进行。如四川测绘学堂虽采用西方教育制度, 讲授西文、地舆、算学、体操等科目^①, 但毕业生学识实在堪忧。1905年, 四川铁路公司为勘验宜夔铁路沿线地貌, 拟招取测绘学生数十人, 投考者成绩多不及格。^② 受旧学影响, 不少新式学堂学生秉持着儒家静以修身的治学传统, 偏好文章义理考索, 轻视声光化电和需要动手实验的自然科学。一些不爱运动的学生甚至被人质疑“虚弱孱小, 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③。除了学生问题, 习惯旧式教育的教师, 在知识结构的更新与调整上与推崇新知的学生节奏不齐。成都中学堂地理教师把澳洲画到西半球, 把土耳其读作土耳其国。^④ 一些教员甚至分不清东西南北, “以五行八卦辨正方位”^⑤。到了1941年的测绘学堂的地理课上, “同学有一半多没有书, 教师讲的又不大明白, 讲到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许多同学都借着地理课, 办别的功课”^⑥。西方地学知识的引介不完善、学堂考核制度落实也并不到位, 甚至教师和学生的治学观念还停留在传统旧学的应试态度之上, 由此毕业的学生进入实地测绘的工作现场, 很难让人将他们视作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权威人士, 无怪不少近代方志纂者感慨到, “近年所绘县图不无缺误”^⑦、“本图仓卒绘制完成, 错误脱略之处甚多”^⑧。

第二, 明晰的专业分工与不匹配的社会角色。据潘晟等人考察, 明清两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主要由官员、儒士、绘工、匠人等人组成。^⑨ 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 绘制知识的更新导致专业分工愈加明晰, 一些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被细化为“测量”与“绘图”两个环节, 每个环节由专人负责。如民国《汉源县志》地图的测量和绘图分别由曹宅麻与陈希圣完成^⑩; 民国《绵竹县志》地图测绘和绘图分别由罗文新、吕友芝与吴文英充任。^⑪ 与他们明晰的专业分工不相匹配的是近代方志绘制人员模糊的社会角色。按照常理来看, 当社会专业分工达到一定程度时, 每个人都能在“合适位置”找到自己对应的社会角色。比如警察大概率由警官学堂毕业生充当, 翻译员毕业于语言学堂, 诸如此类, 从事与地理测量工作的人员理应毕业于测绘学堂。但根据考察,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测绘人员的“来路”与“去向”都未有明晰的专业指向。从

① 参见《公报: 铁路公司详责测绘学堂教习学生名折及功课表文》, 《四川官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五日, 第29册, 第23—25页。

② 参见《四川测绘招考》, 《广益丛报》1906年第4卷第105期, “上编政事门”, 第1页。

③ 寿尔《田凫号航行记》,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 第386页。

④ 参见《学堂笑史》, 《光华日报》1910年12月3日—12日。

⑤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第172页。

⑥ 冷菊《地理课堂上天冷先生讲笑话 不许学生看闲书》, 《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2卷第15期。

⑦ 张仲孝等修, 马文灿等纂: 民国《巴中县志》卷首《凡例》, 民国16年(1927)铅印本, 不著页码。

⑧ 刘佑修, 刘成荣纂: 民国《双流县志·双流全县地形图》, 民国26年铅印本, 不著页码。

⑨ 参见潘晟《谁的叙述: 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刘高伟: 《清代方志地图作者初探》,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年, 第33—66页; 韩天《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及其作者考证》,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 第58—103页。

⑩ 参见刘裕常修, 王琢纂: 民国《汉源县志》, “序”, 民国30年铅印本, 第2页。

⑪ 参见王佐修, 黄尚毅等纂: 民国《绵竹县志》卷1《职员》, 民国9年刻本, 第2页。

“来路”来看，他们并不全部来自测绘学堂，有些人出自师范学堂，有些毕业于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从“去向”来说，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往往在教育界、商界、政界、实业界等一身兼数职。除地图测绘外，其他学科同样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尚未培养出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人才，也无法全面提供专业化的分工环境，精英阶层在各自领域内的位置处于悬置而非固定状态。社会整体环境允许（或者说迫使）他们在不同场合扮演社会所需的角色以保障各项事业的有序开展。可以说，每个知识精英都恰好不仅是他所应是的那个人。

第三，紧迫的社会需求与模糊的人才定位。进入抗战阶段，地图的测绘、使用、管理愈加严格，方志地图本身具有的“何处可以扼险，何处可以进兵”^①的军事功用，尤为时人所瞩目。当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志士更加意识到培养测绘人才的重要性。民国中央测量学校教育长古振今预计，以千分之一比例尺绘制全国地籍图，约有550万幅，“最少需要动员五千五百测量员”^②，加上工程图、水利图、城市图等其他类型地图，则所需测量员数量实难估量。虽然国民政府测绘事业稳步推进，培养了大批从事测绘事业的人才，但测绘学校教育问题依然不少，包括但不限于学校师生人数比例不合理；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缺少专业的三角地形航测制设备和各种物理化学仪器；缺失天文台、基线场、大三角点网、水准点网等测量试验区域；学校测绘试验产出成果无法有效对接工厂需求，等等。除了上述客观问题外，测绘人才培养定位失准也是导致测绘人员数量少，高级研究人才亦少的重要原因。古振今提出的把测绘“研究型”和“事业型”两种人才分开培养的方法，可能是破解之道。同时，事业型人才要给予良好的薪资，赋予他们稳定的社会地位，并形成制度性的保障。^③若反之解读古振今的说辞，可以知道当时从事测绘事业的人员技术经验差异大、学资水准高低不齐、社会地位较低、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因此，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难以形成一个在年龄、智识、心力等方面都相对稳定的阶层。

当传统科举制度的废止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那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自然改变。传统士人为了生计，或主动或被迫从事一些自己曾经轻蔑的职业，如刘大鹏对当时士绅子弟与读书之士“率皆出门为商”^④的记载，就鲜明地反映了社会剧变下原有“士农工商”秩序的崩坏。这其中也包括过去被视作“奇技淫巧”的地图测绘。正如近人蒋维乔对自我身份与所处时代的判断那样“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⑤既然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过渡与转换的“混沌时代”，那么在此背景下，人作为社会主体一时间难以适应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新要求也就不难理解。对个体而言，尚未完成“近代化”的他们，却背负着国人对他们快速完成国家近代化的沉重期许。换言之，近代知识精英既要完成身份转型，又要稳定产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实业成果，这显然操之过急。随着社会变动节奏的加快，读书人对新旧知识资源的习得与重释、个体身份的内化与重塑之间的张力也被逐渐拉大，绘制群体身份的不平衡感愈加强烈，社会角色冲突的现象也就频频出现了。

① 范涑清等修，何毕元等纂：咸丰《资阳县志》卷首《图考》，咸丰十年（1860）刻本，第2页。

② 古振今《测量教育的研讨》，《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刊》1942年第7期。

③ 参见古振今《测量教育的研讨》，《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刊》1942年第7期。

④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⑤ 蒋维乔著，林盼、胡欣轩、王卫东整理《蒋维乔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册，第87页。

三 新旧皆非：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的制图观转型

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因处于过渡时代，虽在社会学意义上完成了身份的重塑，但在思想观念层面时时处处表现出的认同困境，显示他们制图观念的转型很难一蹴而就。下面，笔者拟从“分野”“疆界”“方位”“八景”这四个影响近代方志地图绘制的关键要素入手，揭示绘制群体制图时“新旧皆非”的矛盾观念。

（一）分野观

地图作为一种图像叙述，和文字一样，是人群思想观念的集合。大多数人透过绘制者呈现的地图景观观察、领会和搭建起对未知世界的空间想象。所以，“这个世界的大小、上下、方位、比例，都渗透了绘制者的观念”^①。西南方志地图亦然。只不过，在近代这个特殊的转型阶段，这种观念处于一种新旧皆非、浑融中西、摇摆不定、互起互伏的状态之中。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必须首先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方志地图中位居卷首的“分野图”。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将明万历十二年（158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用西洋方法绘制《山海輿地全图》视作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那么中国人关于“天地”“分野”的整体性宇宙空间格局的认知显然已经开始崩坏。但是，这种能扭转中国人“天下”“四夷”观念的地图绘制方法毕竟更早为上层统治者注意，下层士大夫与民众接触和认知的时间显然更晚。据杨彬镛考证，“地方志中的分野记述完全由科学的地理坐标所取代几经曲折”。他认为，当时的方志学家采用地理坐标，摒弃分野观念的态度“是慎之又慎，抑或是将信将疑的”^②。这一论说在近代西南方志地图中不乏例证，如民国《夹江县志》指出“至星野一条，讷无定论。旧依府志从《晋书》入参三度之说，今仍遵之。”^③夹江县方志地图绘者在知道时人对星野态度的前提下，仍将旧志内容孱入新志，即是对西方坐标定位可靠性的“将信将疑”。但大多数方志地图绘制者表示出对新知的接受与使用。如宣统《续修蒙自县志》纂者已经理解自己所处的地域，实非古人所描述的“天下中心”，“星野分次，中国不尽地球”^④，所以传统分野的知识体系实难说服“睁眼看世界”的国人。不少近代西南方志地图都采取三角测量方法，依据经线距离北京度数，纬线距离赤道度数来标示具体位置。甚至有绘制者认为“经纬度定，则各处之方位、道里皆定。”^⑤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分野观处于新旧转换之间。

（二）疆界观

传统方志地图基本采用山水写意和象形画法表示城池、衙署、街巷、山脉、河道等景观，一些明清方志地图，绘制者不仅将本县輿地展示图上，顺带还将毗邻的府州县境绘于其中。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双流县志》纂者甚至把《成都府所属图》置于本志卷首，本境之外的资阳县、仁寿县、汶川县、邛州、彭山县等州县都被详加记录，但这种状态在晚清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清末疆土频丧，边疆地区如云南等地志书，开始将勘界图绘于志书中，“以正疆界，以启爱乡之思”^⑥。另一方面，1908年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促发知识精英地域意识的生成，如民国《昭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9页。

② 杨彬镛《方志中的分野与地理坐标》，《中国测绘报》2002年10月18日，第3版。

③ 罗国钧监修，刘作铭、薛志清等纂辑：民国《夹江县志》卷首《凡例》，第8页。

④ 佚名撰：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卷首《目录·编辑大意》，上海古籍书店，1961年影印本，第12页。

⑤ 岑毓英修，王文韶纂：光绪《云南通志》卷5《地理志之一輿图》，光绪二十年刻本，第2页。

⑥ 龙云修，周钟岳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首《凡例》，民国38年（1949）铅印本，第2—3页。

《通县志稿》明确表示“地图仅绘本邑，不涉他县。”^①实际上，对于本县本邑地图，在西方地学测绘知识背景下，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尚因恶劣的绘制条件而心余力绌^②，更何况与本县毗连之他境。诚如《思南县志稿》绘制者所言“然县地广袤数里百里，采访者，虽有遍历之志，力不从心。”^③伴随着“不绘他县”观念的兴起，“县界”“乡界”“区界”意识日益突显。不少近代西南方志地图图例中，都将“界线”视作重要一例，分别以不同颜色标识于图上。如民国《安县志》所载《安县全图》区、县、场界用黑、橙、红线区分，每场镇所辖范围也用不同颜色分区设色，一目了然。^④尤其是在清末自治背景下，自治带来的粮籍、财税、赋役等现实利益纠纷，使得州县统治者尤为关心“插花地”的归属问题。一些近代西南方志地图明确将插花地绘入本县，且用不同颜色着重表示，即使因地图尺幅偏小，其他内容不能毕载，也“不敢略其插花、穹越之境”^⑤，并正告毗邻州县“辖境内粮籍载于他县者特色表出，呈请政府璧还本县，以完疆域。”^⑥

(三) 方位观

传统方志地图的方位，到目前来看，几乎没有一种可以依循的定准。受制于方志地图本身性质、画面表达、使用途径等因素影响，绘制群体的方位观念比较混乱，既有上北下南、上南下北的一般取向，也存在左南右北的特殊案例。^⑦可以说，传统方志地图的方位取向是多元并存的。到了近代，随着经纬线引入地图测绘，传统四至八到的方位指向渐被上北下南的指向标所取代。《续遵义府志》地图绘者直言道“然今者闭户以求山川，绕室而趋求所谓四至八到，不嫌隔靴搔痒。”^⑧但是，传统四至的方位表达习惯并不会立刻被摒弃，相反，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者在接触西方地学测绘知识后，往往将这类迥异于自己传统认知的新知，按照“中体西用”的思路，强行将其纳入到传统思想体系的框架之中，从而理所应然的使用。一些方志地图绘者认为，“近世西学日精，测绘之术与中国古法暗合”，对于方位的重要性也秉持着传统认知，“师准望之意，首正方位……庶几方位准定，而市场之布列，距离之远近，自无所复差”^⑨。至于如何测量方位，除了经纬定准之外，一些传统方法也被近代西南方志制图者使用，如“边地须按定四正四隅，画清临封疆界，或方隅不正确，即用罗针二十四向，或兼针定之”^⑩。对于如何理解近代西南方志地图多采用“上北下南”指向，宣统《蒙自县志》绘者也从传统经验出发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他认为，万事万物“多背北而向南”，之所以“必南下北上”，是因为从绘制者的视角出发，“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所以所绘之物与绘图者“作对面观”，那么地图上的内容“则必南下北上”。最后，《蒙自县志》绘者强调，“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认为自己所论，绝非“好言尚古”之辈的说辞，而是从情理出发，认真观察日常生活而得来的常识。此等表述，

① 卢金锡撰：民国《昭通县志稿》卷1《凡例》，民国27年（1938）铅印本，第4页。

② 参见罗宝川《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的转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3辑。

③ 马震昆纂：民国《思南县志稿》卷2《舆地志》，民国9年初印，1965年油印本，第1页。

④ 参见夏时行修，刘旦纂：民国《安县志》卷1《安县全图》，民国27年石印本，不著页码。

⑤ 高承瀛等修，吴嘉谟、龚煦春纂：光绪《井研志》卷1《疆域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第8页。

⑥ 王克礼修，罗映湘纂：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1编《重修凡例》，民国29年铅印本，第1页。

⑦ 参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京城图》，《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0册，第5页。

⑧ 杨兆麟、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卷1《图说》，民国25年刻本，第1页。

⑨ 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民国《达县志》卷首《图经》，民国22年刻本，第29页。

⑩ 郑贤书等修，张森楷纂：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测绘条例》，第1页。

与传统知识分子推崇的“从目验的天象推论至微妙的玄理，又从微妙的玄理推广于具体的生活”^①的格物致知经验几乎相通，这显然是在根本原理上未能完全接受西洋地学观念，把西方测绘知识统统视作“实用”的经验技术，才会有这样的判断。

（四）八景观

传统方志地图中有一类基于传统山水画表现手法的风景绘画，因文人墨客模范山水，寄情诗画，逐渐创作出大量场景各异、风格固定的“八景”图、诗、词、赋。明清时期，地方官绅有意识地取择地方胜景编入新修志书中，在表达“斯文在兹”的同时，托物言志，宣扬个人政绩，使得“八景图”成为传统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地方八景”入志的合理性引发争议。一些志书编纂者认为，“旧日八景，悉属凑合，且分绘成图，尤嫌丹青附会，无关治迹，免占篇幅”^②。他们强调，方志地图中的八景图，分为数幅，多属附会之作，主张删除，而一些方志地图绘制则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对于八景图浮夸山水，恣意妄作的绘制取向，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据民国《黄平县志》记载，台拱县旧志八景图中有一图“未载太在两里及龙溪场外各地”，新修志者认为，当时的绘者因为无人一履其地，“故不敢以疑似之事，私心伪作。以此足见先达之质直”。换句话说，民国《黄平县志》地图绘者，不仅参考了旧志八景图的内容，而且欣赏旧志绘者谨严客观的制图态度，所以在新修志书中将“旧图仍摹取翻印于末者，于以借为旧志之考鉴，非仅为存古之想已也”^③。当然，并非所有旧志八景图都能被翻印，但至少可以看出过去我们对八景图的看法值得重新考量。此外，新修志者除附载八景于新志卷末之外，还开始利用摄影技术保留这部分内容，如民国《渠县志》绘者“效光鉴取影之法，代以照片，为五色珂罗版复写”渠中八景，“藉美术以著名迹，资见观任便多矣”^④。民国18年《合江县志》在序言之后，列入四组摄影照片——《合江县少岷山摄影》《合江县城治大江对岸之摄影》《合江县城治摄影》《合江西乡丁山之摄影》——以替代传统人工手绘的“八景图”。现代技术手段没有为推动方志地图的更新助力，反而为传统舆图的继续存续提供了一线契机。说到底，还是官员不愿舍弃把八景图作为政绩表达的观念使然。

结 语

一般而言，从传统士大夫演化而来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其身份转型得益于近代知识信息生产、传播、流动、交换形成的文化交际网络。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居于上层国家与下层民众之间，其身份认同与近代以来新兴的教师、自由撰稿人、出版人、记者等群体一样，离不开“学校、传媒和结社”^⑤等组织机构的保障。近代各省兴起的测绘学堂自不必言，此外，民国时期由公私机构创办的《测量公报》《测量杂志》《测量界》《测量队》《航空测量专刊》等报刊集结了大量由新式学堂培养的地图测绘人员。他们利用报刊、书籍、杂志等现代传媒工具，在各自能够影响的范围内，有阶序和倾向地向专业同行与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公共的“想象共同体”传递舆论，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人社会”^⑥。许纪霖在讨论“知识人社会”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466页。

② 蓝炳奎等修，吴德准等纂：民国《达县志》卷首《凡例》，民国22年（1933）刻本，第11页。

③ 陈昭令修，李承栋纂：民国《黄平县志》卷1《图画》，“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0册，第16页。

④ 杨维中等修，钟正懋等纂：民国《渠县志》卷1《地理志商略》，民国21年铅印本，第8页。

⑤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7—42页。

⑥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重建社会重心失败之原因时，提出此社会的最终结果是“内外断裂”。对于断裂的主要原因，许纪霖认为在于“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即使留在乡村的士绅，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①。但是，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因为方志编纂的特殊性，比较关注县乡村落事务。地图测绘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深入乡野田间进行实地勘查丈量，即使密林崖壁，也不得不冒险前往。比如曾任云南腾冲县知事的徐嘉钰所辑《澜沧县知事造保地志资料表》详细记载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经纬度数，四至八到等情况。^② 绘制民国《渠县志》地图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部陆地测量总局中校股长罗恺，曾赴宁夏各村落勘测十万分之一地图，并测量当地的天文点。^③ 我们尚且不论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群体向乡野民间的流动是否出于自愿，但他们却真实地联结起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最重要的是搭建起城乡地方精英对话的桥梁。

不过，据笔者考证发现，徐嘉钰、罗恺之辈实在太少，更多的测绘群体不愿躬身踏足乡野僻壤，绘制地图时以“人力经费，两皆缺乏”^④ 或“错误脱略之处自知甚多，阅者谅之”^⑤ 的解释敷衍了事。笔者十分认可许纪霖的判断，方志地图测绘人员由于基本上源自中小县城或乡村地主家庭，所以他们难以像出身在大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那样，依靠大城市的资本精英网络，坦然地背离县域乡村中的宗族家乡。同时，方志地图测绘群体普遍依附于县域成长，致力于在县域内“权势网络”之中，营建家族性或私人性的利益网络，形成所谓的“方志族谱化”^⑥ 现象。这一现象说明近代西南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虽因测绘事务流动于乡村，但他们最终的定位依然是一个企图或已经依附、控制、垄断县域权势网络的群体。所以，即使近代西方测绘知识引入国内，但他们的行为和动机基本上未能摆脱宋明以来“士绅人群”的思维习惯，既未能走向公共领域，也无心经营村庄事务，难以肩负起重建社会重心的责任。由此，不少近代西南方志地图中充斥着“非科学”的地理要素，展现出粗疏浅陋的绘制水准等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② 参见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③ 参见《国民政府指令：第一四四八号：呈据军政部呈荐罗恺为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中校股长附呈名单履历转请鉴核任命由》，《国民政府公报》（南京）1932年10月4日，第5—6页。

④ 王克礼纂，罗映湘纂：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封底”，不著页码。

⑤ 刘佑等修，刘咸荣纂：民国《双流县志》，民国10年（1921）铅印本，不著页码。

⑥ 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

The Drawing of Early Qing Dynasty Local Records Coastal Defense Maps and Analysis of Their Usages *Du Xiaowei* (25)

Qing Dynasty implemented an inner and outer seas management system , in which local records coastal defense maps were important in presenting the maritime spatial cogni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local gentries. The information for local records coastal defense maps drawn during early Qing Dynasty , came from local records , local archives , field investigations , and other coastal defense maps. The purposes of these drawings were to present situations of territorial coastal areas ,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fficials in governing the people , to praise the emperors of their effective governance , and to be used for management of the coastal areas and division of territories and for arresting burglars and maintaining security , having certain political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values. The usage of local records coastal defense maps in coastal defense affairs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entries in coastal defense records and territorial records , and references such as local archives and military station maps , so as to present the maritime spatial consciousness and coastal territories administrative needs of local officials in entirety , which were also important expressions of the “sea and coast as one body” maritime outlook of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Southwestern Local Records Map Drawers’Status Identity and Map-making Outlook Transformation During Modern Period *Chen Lin , Luo Baochuan* (36)

Along with Western geography knowledges coming into China in modern period , problems such as status shifting and outlook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on part of the local records map drawers. Through sorting of life stories of more than 180 local records map drawers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during modern period , we discovered that on the one hand , this group of people failed to form stable status identity , nor did they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gentry society”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 since they were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odern times , the map-making outlook of the drawers presented a contradictory state being “neither new nor old”. Explorations of the status evolution and outlook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map drawers in southwestern region during modern period ,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features and principles of traditional geography concepts as well as newly emerged geography theories represented by these people ,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more in-depth research of China local records studies and cartography during modern period.

Modern Perio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as Seen in Pucheng County Records Manuscripts *Hou Xiaodong* (48)

Pucheng County Records Manuscripts compil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form the 29th to the 37th